

政治社会学导论

(第4版)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OCIOLOGY

ANTHONY M. ORUM

[美] 安东尼·奥罗姆 著

张华青 何俊志 孙嘉明 等译

倪世雄 校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014033923

DO
198-2

政治社会学导论

(第4版)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OCIOLOGY

ANTHONY M. ORUM

[美] 安东尼·奥罗姆 著

张华青 何俊志 孙嘉明 等译

倪世雄 校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DO / 198-2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北航

C172226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社会学导论:第4版/(美)奥罗姆(Orum, A.)
著;张华青等译.—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书名原文: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ociology

ISBN 978-7-208-12093-8

I. ①政… II. ①奥… ②张… III. ①政治社会学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3671 号

责任编辑 孙 瑜

封面装帧 王小阳

政治社会学导论

(第4版)

[美]安东尼·奥罗姆 著

张华青 何俊志 孙嘉明 等译

倪世雄 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1 插页 4 字数 297,000

2014年3月第2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2093-8/D·2456

定价 45.00 元

推荐序言

林尚立

人是必须过政治生活的，中国人也不例外。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自然也就有不同的政治生活。中国是一个有历史、有文化的国家，有自己独特的政治生活，并创造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但是，任何民族都无法逆历史潮流而动，迈向现代是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然选择。当中国社会迈向现代的时候，中国就不得不告别其传统的政治生活，接受现代的政治生活，并由此走上了民主共和之路。对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来说，现代政治生活是外来的，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必须寄托于现代政治生活在中国的建构。所以，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一开始就进行这样的努力：理解和把握现代政治生活，并使其在中国社会得以健康地确立和发展。在这种努力下，中国引进了政治学，试图从科学的高度来把握现代政治生活原理。

中国对现代政治生活的追求，是从制度追求开始的，强调制度的引入与制度的更替，是中国走向富强和现代化的重要前提。为此，我们先后进行了君主立宪的变革、民主共和的革命和人民民主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不少经验与教训都告诉中国人这样一个道理：现代政治生活虽然是外来的，但最终是自己的。我们要走向民主，就必须从自身出发，秉承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规律，创造有中国根基的现代政治生活。因此，把握自己与把握现代政治生活原理是同等重要的，而要把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首先是科学而全面地把握现代政治生活原理。这种认识的积累，使中国对现代政治生活的关注与探讨，逐渐从制度的迷信走出来，开始从经济与社

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现代政治生活的丰富多样性中,来全面而深刻地理解与把握现代政治生活原理。这种变化出现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其现实效应就是促使人们能够更加理性、更加深入地来研究和把握现代政治生活及其在中国的建设与发展。美国学者A.奥罗姆的《政治学社会学导论》(1982年版)就是在这样的大潮中被译成中文,引入中国。在此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此书为政治社会学这门学问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产生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奥罗姆教授是美国的社会学者,主攻政治社会学、社会学理论、种族团体和社会心理学等。多年的学术研究,使他对政治社会学形成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学术信念:“政治社会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目的,必须是提出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理论,然后对这种理论予以细致而又全面的实践检验。”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信念,奥罗姆在时刻关注现实社会变化与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在政治社会学研究中所提出的观点和研究体系。为此,他的《政治社会学导论》从1978年第一次出版至今,修改过三次,形成四个版本。这里所呈现的是其第4版。作者在其第4版的序言中,比较了第4版与此前版本的不同,并认为这种不同是巨大的,而其根源在于现实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他这样说道:“同第3版相比较,新的版本有着许多方面的不同。其主要原因是,世界本身变化如此之大,迫使社会学家重新考虑许多老问题。我已试图把自己更多的注意力关注于世界的改变,以及由此而孕育的政治社会学家的新思维。在1996年的文章结语中我曾说到,我所关注的政治社会学几乎不是那二三十年前曾经致力于研究的那些至关重要的领域。当然,其中有一部分领域可能仍然十分引人注目,诸如社会运动的机制,但其他部分似乎好像行将没落,诸如美国政治和权力的性质等。”奥罗姆的学术信仰与学术实践是真诚而科学的,所以,这本新版《政治社会学导论》是一部有历史感、时代感和现实感的著作,要是将其与此前的版本比较阅读,那么,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政治社会学学术体系的丰富与发展,更看到的是现代政治生活在世纪转换过程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政治社会学实际上是关于现代政治生活的学问,因为它很难超越现实的考察和现实的关怀来研究政治生活。政治生活的主体,历来是两极

四大要素所构成：一极是人；另一极就是制度。在这两极中间有两个要素，一是人的观念，可概括为价值；二是作为制度基础的组织。这两大要素加上两极，就构成政治生活的四大要素，即人、价值、组织与制度。政治生活就是在这四大要素的互动中展开的。现代政治生活与传统政治生活的最大差别，就是现代政治生活是建立在人的政治解放基础上的，即建立在人的政治平等基础上的。虽然现代政治生活形成的重要前提是人的自主、独立与解放，但是现代政治学从一开始就把视野集中在国家的权力与制度建构上，即集中在政治的制度层面，而不是集中在人参与其中所展开的实际的政治生活上。二战前的政治学，把制度设计、确立、运作与改善作为政治的核心问题，而忽略了政治生活的另一极——人的要素。到了战后，作为对这一取向纠偏，甚或说反叛的结果是，政治学走向科学的行为主义政治学，于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关注人的行为。但是，这种关注实际上依然局限在政治制度层面上，并没有深入到政治生活之中。这是因为，行政主义政治学虽然逐渐弱化了对制度与权力本身的关注，而更多地关注制度中的人，其中包括运行制度的人与制度所规范的人，但其实际的政治关怀还是制度本身，只不过从关怀国家权力与制度的建构转向关怀国家权力与制度的运行。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到了20世纪中叶，人们对现代政治中的国家权力及其制度形式有了比较普遍的共识，于是思考的重点就从应该建构怎样的制度，转向思考如何使现有的制度获得合理与有效的运行。这种摇摆于制度与制度行动者两极的思维模式，正是政治社会学所力图打破的。在政治学社会学看来，政治不是简单的权力与制度建构及其运行，而是人与制度的不断互动所构成的政治生活，因而不仅存在于上层建筑的层面，而且存在于人们日常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之中。这决定了把握权力与制度固然重要，但是认识与把握生动的现实政治生活更为重要。上层建筑层面上的规范政治，只有在现实生动的政治生活中才能显现真实的意义。社会学丰富的思想和细致的观察，为政治社会学在这方面的努力提供了相当扎实的理论、经验与方法论的基础。奥罗姆的努力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是一个社会学者，从社会学视角构建出了一个鲜活生动而变化多样的现代政治生活，其学术成果既具有政治学的意义，也有社会学的价值。

从功能来看,奥罗姆最终是把这本书当作教材的,但是从创作来看,奥罗姆是把这本教材当作学术著作来写的,在每一章的最后都有一个学术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他在第4版中形成了自己比较成熟的政治社会学分析框架,即由权力、权威、制度、网络与文化所构成的分析框架,而这种分析框架在此前的版本中并不明晰。考察奥罗姆政治社会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和心路历程,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所建构的这个分析框架,一方面得益于他对人类政治生活,尤其美国政治生活与政治发展的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另一方面得益于他对前人学术经典的长期研读与深入思考。在本书的导言中,他以此作为他与其他学者研究政治社会学的一个区别:“我们必须承认,没有深入地钻研这些杰出学者的著作,人们也能理解现代政治社会学家的作品。的确,许多政治社会学家进行他们的研究,却没有花费时间向这些伟人的著作求教。尽管这些伟人所提出的理论从许多方面来看似乎过时,但我本人依然确信,这些著作依旧提供了关于如何建构人类世界的极好的全景模型,提供了走出纷繁复杂之迷宫的线路图。按照这一方式,他们继续激发着我们的研究和想象力。”在他的心目中,这些伟人包括:马克思、韦伯、杜尔克姆和托克维尔。显然,这些伟人都是研究现代政治生活的大思想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解析了现代政治生活的运行机理与发展规律。在这其中,马克思认识现代政治生活的方法论对奥罗姆有相当大的影响。

借助这个具有现实经验基础与思想史上的理论基础的框架,奥罗姆力图在前人的思想基础上,系统地把握现代政治生活的运动规律与发展趋势。为此,他分析了经济与政治、国家与社会、公民社会与政治、政治统治的基本形式、现代美国的权力与平等、现代大都市的权力与政治、政党和政治党派意识、公民政治参与、现代世界的民族国家建设。这些论题的选择,足以表明作为一名社会学家的政治思考与政治学家的政治思考的差异是有区别的,即他对现代政治生活的分析与把握,不是从比较政治学的分析概念出发来分析政治生活的,而是力图从机理与规律出发来分析现代政治生活。这种把握使得他的《政治社会学导论》不仅要建构政治社会学本身,而且要力图用政治社会学来分析现代政治生活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即他在导言一开头就提出的我们当今时代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旧的国家已崩溃，而新的国家则建立在他们的废墟之上。资本主义和利润追求正在原来被共产主义主导的世界中大行其道。民主已取得胜利，但旧的民主仍然在寻求努力获得新生的方式。国家之间的疆域障碍已打破，允许成千上万的移民能够横跨全球自由地旅居。世界面临的威胁不再是巨大的战争，而且小规模集结的个体行动的恐怖主义活动。同早年的军事力量相比较，这些恐怖主义活动更为直接而且更为危险，并更具潜在的灾难性。”为此，“在本书中，我将阐释政治社会学家关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方式”。很显然，奥罗姆要思考这些问题，但不是要给人们这些问题的答案，而是要给人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式：概念、理论与方法。就方法而言，他十分强调把握这些问题的时空框架，认为应该从整体的、联系的空间维度与变化和发展的时间维度来把握认识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他明确指出：“政治社会学家具有对世界全方位的看法，并探寻着政治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尤其是经济制度。”“政治社会学家十分感兴趣于对现时的政治建构和政治机构的剖析。因此，对于许多现代政治学家来说，时间和历史在他们的研究中更具重要性，这不仅在于分析的手段上，而且更明显地是在于研究的内容上。”系统的分析框架、系统的现实关怀加上比较切实的学术定位，使本书真正展现给读者的是现代政治生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及现代政治生活的理论与实践、危机与挑战。虽然奥罗姆的研究主要以美国为现实经验的基础，但其基于政治社会学的学术力量对现代政治生活所进行的学术把握，还是有给了人们许多有价值的启发。从政治学者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些启发十分有助于人们更加理性、更加深刻地来认识和把握现代政治生活。

其一，现代政治生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形成与发展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来看，现代政治生活是随着现代社会的产生形成的。基于现代社会发展而诞生的现代国家是现代政治生活的核心力量，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的有机互动，即现代国家制度与拥有平等独立地位社会主体之间的有机互动，构成了现代政治生活。但是，正如确立了民主制度并不等于就有了健全民主生活一样，现代政治生活出现后也有一个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决定性的力量，但现代政治生活所需要的价值建构、公民社会的发育以及宪政制度的完善

也是不可缺少的。虽然政治的发展不能脱离经济与社会发展,但是经济与社会越发展,对政治发展的要求就越发深刻,其核心就是发育和完善健康的现代政治生活。一旦政治发展到这个层面,现代政治生活的健全与完善将更多地取决于政治生活构成要素本身的发展:如公民的成长、价值的认同、组织的优化与制度的健全等等。不要否定经济发展在政治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但同时也不要忽视现代政治生活所必须的基本要素的具备与完善。

其二,现代政治生活是政治文明发展的普遍要求,但其实际的展开与发展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现代政治生活确实有其内在的普遍原则,如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等等。但是,基于这些普遍原则所形成的现代政治生活,都是具体的,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想模式。道理很简单,只要是现实的,任何形式的现代政治生活都不是静止的,都是变化的和发展的,因而也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而且,现代政治生活所基于的现实社会基础在各国的差异性之大,往往要超出一般的想象。所以,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政治生活的成长都必须根植于本国的国情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会有自己的优势,但同时也会有自己的问题与矛盾。奥罗姆对美国经验的深刻体察和分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指出美国虽然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但这样的一个国家却是以一种同我们对民主的常识截然相反的方式在运作”。所以,任何国家在构建现代政治生活方面的所有努力,都不能建立在简单的模仿上,而应该建立在探索和实践上,在这个过程中,对他国的经验与教训的研究与总结是有意义的。

其三,现代政治生活成长的关键在于现代国家建设,而现代国家建设的成败,取决于现代国家建设的战略选择。在当今世界,任何力图走向民主的国家,都必须建构现代政治生活,而现代政治生活的建构,不仅需要现代社会的发展,而且需要现代国家的成长。然而,同那些随着自己历史的发展逻辑走入现代社会,进而确立现代国家的一些西方国家发展不同,许多国家往往是在缺乏现代社会基础的条件下,开始现代国家建设的,并力图用现代国家的力量来推进现代社会的发育,并最终形成现代社会发展与现代国家成长的有机统一。因此,对许多国家来说,这决定了其迈入现代政治生活的关键在于要进行比较成功的现代国家建设,现代国家建设一旦失败,以民主化为取向的现代政治生活也就无从谈起。但是,在世

界市场把各国联系起来的当代世界,国家建设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国家建设战略的合理选择。这种战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现代国家建设所需之基本要件和实际行动力量的合理组合,使其共同发挥积极的正面效应;二是对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独立性的合理把握,因为失去了独立性的依附性发展,随时可能使国家建设因外力的作用而走向失败。显然,成功国家建设的关键不在于形成多少现代政治文明的要素,而在于从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规律中获得了有效把握自身发展的智慧、经验与能力。

其四,现代政治生活的基础在于公民社会的成长,而公民社会的成长,既有赖于经济的发展,也有赖于社会的建设与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社会是相对于现代国家而言的,它以现代社会为基础,但不等于现代社会。这是因为,公民社会所需要的主体,不是一般的市民,而是由拥有共同国家认同、平等权利地位、自我组织与管理能力的公民所构成。这种公民主体的形成,自然需要国家建设的有效发展,需要保障和实现公民平等权利的民主、法治的完善,需要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中间力量的成长,需要社会主体公共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也许对于许多发达国家来说,其当下的公民社会的维系和发展,主要取决于社会主体公共意识的维系与自我管理能力的进一步的完善,所以,发达国家的公民社会建设把目光盯在了社会资本上。但是,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重视社会资本的建设仅仅是公民社会建设的一个方面,它更需要国家建设、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健康发展来支撑公民社会的成长。当然,这其中公民教育的重要性是时刻不能忽视的,因为信仰与价值对公民的塑造常常具有决定性的和持久性的作用。

最后,现代政治生活的重要支配力量是政党,但现代政治生活发展如何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党在民主化过程中的前途和命运。政党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力量,既是整合与协调社会的力量,同时也是运行国家权力、引导社会发展的力量,因而对平衡国家与社会关系,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意志有直接的作用。虽然现代政治生活是现代政党产生和发展的逻辑前提,但在现实中,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党则往往是构建现代政治生活的核心力量。在许多国家,政党的纲领、组织、社会基础以及行动方式,直接决定着现代政治生活建构的成败以及现代政治生活的具体形

态。奥罗姆对美国政党与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状况的考察表明：一个国家走向现代民主，建构现代政治生活是现代化的必然，政党成为现代政治生活的支配力量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但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则在根本上取决于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同时，政党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实际上并不完全取决于政党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社会与政治发展对政党的要求，取决于现代政治生活形态的变化与发展。所以，从根本上讲，虽然政党是现代政治生活的重要支配力量，但是政党的前提与命运不是由政党自身决定的，而是由现代政治生活的实际变化与发展所决定的。认识到这一点，任何明智的政党都会在现代化与民主化的历史进程中，努力与现代政治生活的成长保持积极的互动关系，从而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中巩固自身的社会基础，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潮流中努力提高自身驾驭国家的能力与水平。

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创造了现代政治生活；而现代政治生活的成长，则为人类实现更大的自由与解放提供了新的基础与可能。把握现代政治生活的发展规律，推动现代政治生活的全面健康发展，是人类共同使命，需要世界各国的贡献，自然包括各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贡献。所以，研究与探索现代政治生活，不能仅仅局限于解释现代政治生活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要回答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何过上健康而富有活力的现代政治生活。因此，不论是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还是政治学的研究，或者是其他学科对现代政治生活的研究，既要有学术的使命感，也要有社会的使命感。奥罗姆在政治社会学领域长期不懈的努力多少体现了这种精神。我并不同意他的一些具体观点，但他在长期研究中所领悟出来的一种研究精神是有借鉴意义的。为此，我特将有关的文字摘录于此，作为本文的结语：

“一个人必须在一种好奇和开放的状态中接近世界，并决意作出有关世界的各种结论，以充分的能耐来提出对世界的看法和判断，并坚持不懈地去了解那些判断是否精确无误。这就是政治学经常证明其所为；那也是追求学问所必须的。”

2006年8月17日于复旦燕园

中文版序

对本书的新版本被译为中文,我感到很荣幸。在1988年的初版《政治社会学导论》翻译成中文出版后,我对此书作了非常大的重新修订,使之在内容上得到全面的更新。

我想先谈谈我在中国的个人经验。那是在1988年,我被翻译我那本书的复旦大学年轻学者邀请到中国进行讲学。我非常高兴地见到了那里的老师和学生们。自那以后,其中有些人来到美国并在我所在的芝加哥伊利诺伊州大学学习。我在1988年对中国的访问使我大开眼界;那是我毕生想要访问的国家,实际上自孩提时起我就熟知一些中国的情况,但并不奢望会有机会进行访问。在中国的那些日子里,我非常惊讶我的所见所闻,尤其是那广袤无垠的农村以及人潮涌般的上海。

在中国的这一经历,令我十分陶醉。当我回到美国后,我曾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一本五十多页的日记以赠我的朋友和家人。现在回过头去看看过去写下的日记,我发现正是那些我所接触的人,和他们对于我这样对中文一窍不通而初次冒险到中国一游的外国人的仁慈和友爱,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在上海,有好几个学生陪伴着我,他们在我演讲时给我作翻译,在我所到之处都由他们当向导,并陪伴我去上海黄浦江边上的外滩。而且,我还被邀请去了杭州,一路上朋友们给我介绍了中国所发生的变化以及为什么会发生变化的缘由等。在那里,我也被邀请开设了一系列有关美国民主政治的讲座。

我发现,我当时在中国的演讲过程相当激动人心:在拥挤的大厅里,

学生(甚至还有些成人)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我所介绍的每一个有关美国民主政治如何运作的观点和主张。(在我回到美国后,我曾与朋友们讲起我在中国演讲时主持人和听众是如何的专心致志,由此我希望我美国的学生在听我讲座时如能有一半这样的专心就好了)。中国之行,对我确实是一次独特的和给人印象深刻的经历,它无疑证实了我从小就有的想法:走访中国会是多么地令人神往啊。

如果说我在1988年的中国之行令我感到惊讶,那么,可以想象我在2002年再次去这一国度时的感觉如何了!我从没有看到过一个国家,特别是一座城市,像上海,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和有限的空间内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到处是新盖的楼房,高楼大厦直插云霄,它们给了我特别深刻的印象。黄浦江边上的外滩几年前好像是美丽神圣的早年遗迹,现在则焕发了新的活力。尤其是在晚上,这里特别像在巴黎、伦敦和纽约,甚至我所居住的芝加哥城的夜景。这里有着如此这般的活力,如此这般的巨变,使得上海以及中国东南沿海城市从20世纪初期瞬间跃入21世纪初期。所有这一切巨变,竟是在如此短暂的十年间!当我在1988年访问上海时,浦东新区还没有出现;然而到2002年,那里已经成为工商和金融业的重镇了。

三年前我在中国所看到的,毕竟只是现今这一时代世界各地发生巨变的一个小小的反映。这些众多的变化是由全球化的经济活动所驱使的,在这一过程中,旧的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和屏障开始消失,政治以及国家发展也随之变化。因此,在这一新版本中我努力把重点聚焦在这些问题上,特别是有关新的政治运动和正在发生中的变化。

我相信,尤其是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可以从本书中了解到以下一些问题。首先,当今世界地方和区域所起的作用愈益突出且重要。在这本书的有关城市和地方的章节中,我考察了那些城市建设的方式,特别是在美国,这些城市是如何真正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中心。其次,国家事务中公民社会的重要性,这一内容始终贯穿于整本书,而特别集中在评论19世纪的政治学家,诸如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以及最近的罗伯特·普特南他们有关公民社会的思想。再者,则是有关在世界上不同地区进行国家建设的各种有效途径。国家建设在美国只是一种形式,但是

国家建设在世界其他地区则会既有形式上的不同,又有着速度上的不同发展。当然,就国家建设的主要成就来看,无非就是看哪种形式能够使其所有的居民享有比较充分的自由和经济的繁荣。

我要感谢我的老朋友,像孙嘉明等在翻译这本书方面所作的努力,我把此书献给所有我在中国所认识的朋友,以及希望在将来有机会结交的朋友。我衷心希望将来世界上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少,不同种族和信仰的人们都能拥有美好灿烂的前程。

安东尼·奥罗姆

英文版序

若干年前，巴鲁克·基姆林约我撰写一篇有关政治社会学及其在美国发展过程的文章，我予以应允。这部分原因在于，当时我已有相当长的时间未曾反思过这一领域，想借此机会重新寻觅我曾经关注过的这个领域在过去10来年有何变化。于是，我试图把这一领域的某些变化归结为，从基于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行为主义研究转向更为强调制度及其发展。不可否认，我当时的这一思路是受到了戴维·布赖恩·罗伯逊在1993年《社会科学史》期刊上发表的“重返美国政治学的新制度主义及其历史”这篇文章的鼓励而形成的。

我的那篇文章发表后得到了一些有趣的反应，其中大多数是我未曾料及的。除了一些赞扬外，也有些是来自于对这一思路的拥护者，诸如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和西达·斯科克波尔，然而他们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视角与我还是有所不同。这就开始促使我重新思索我在20世纪70年代晚些时候最初以一本教科书形式出版的政治社会学框架体系，以及在那之后这一领域究竟发生了什么？正当我想借此机会对我的政治社会学框架加以重新整理时，在普利特斯·霍尔出版公司工作的南希·罗伯特建议我对1989年的教科书进行修订。于是，我十分欣然地接受了。当我开始回顾从自己最初的政治社会学原有框架诞生之后这一领域的著作和研究时，这二十年过程中政治社会学所经历的变化让我大为吃惊。同时，我不得不承认，我未能对1989年版本的有关章节作修改而让我自惭形秽。

在少许犹豫之后，我决定着手彻底修订此书。但我并不准备花四年

时间来从事这一任务,因为首先我也不能确保我有这四年时间,其次也是由于我在这一期间还要完成其他项目。其结果便是现在的这本书。

同第3版相比较,新的版本有着许多方面的不同。其主要原因是,世界本身变化如此之大,迫使社会学家重新考虑许多老问题。我已试图把自己更多的注意力关注于世界的改变,以及由此而孕育的政治社会学家的新思维。在1996年的文章结语中我曾说到,我所关注的政治社会学几乎不是那二三十年前曾经致力于研究的那些至关重要的领域。当然,其中有一部分领域可能仍然十分引人注目,诸如社会运动的机制,但其他部分似乎好像行将没落,诸如美国政治和权力的性质等。

在花费将近一年多时间来回顾和反思政治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后,可以说我在1996年所作的评估并不十分精确。政治社会学家已经做了大量新的且颇有成就的研究,但由于世界的迅速发展,这些研究的关联性似乎很快走样,并被迅速发展的事实所超越。尽管他人的研究表达了他们自己对有关问题的判断,我想我重新修订这本《政治社会学导论》的努力,至少代表了作为一名学者的严肃态度,并以此来试图揭示我们时代的一些同政治社会学相关联的重要问题。比如说,什么是现有实践证明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如何使新的国家能有效地、平稳地转变为民主政体?政府在刺激经济以及公民生活方面明显得以改善的过程中能扮演何种角色?公民日常生活是怎样影响到那种围绕着他们的庞大的政治机构的改变?还有城市生活及其居民如何提供一种方式来理解我们所生活的政治世界?

在重新修订这一版本时,我似乎发现,那些10年甚至20年前许多带有学究和抽象特质的深奥问题,现在却有着一种更强的急迫感和直接性。比如说,如何取得民主治理,以及民主是如何得以维持的,这些似乎不再仅仅是学者们的沉思。现在,这些问题已经真正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对这些问题进行周密的思考和清晰的回答,可以在未来岁月里帮助形塑和影响社会和政治机构的形态。就像巴鲁克·基姆林几年前曾对我说过的,现在正是政治社会学家积极地同现实世界重新结合的时候了。

我的1989年版本的两位批评者在帮助我决定重新修订这本书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要感谢他们为此书的出版而做的大量而

又周到的努力。其中一位是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戴恩·E.戴维斯。她的评论切入要害,格外有益。我几乎认为她可以作为这一新版本的非署名合作者。她不仅在一些特殊的问题和事件上,而且在重新安排此书的结构上,均提供了极为精辟的见解。她也示意我保留有关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观点,但需要对它进行新的包装。我深切地感谢她奉献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对书稿提出了坦诚意见,帮助我重新构思新版本的框架。同样,我也诚挚地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丹尼尔·利维。他以同样中肯的评论向我提供了重新修订本书的重要创新思路。此外,我还要感激中部康涅狄格州立大学的玛丽·L.厄特尔,感谢她对本书稿提出的具有深邃的洞察力的建议。当然,我本人将承担此书所有的不足,特别是对于我未能在此书中概括许多有关改变当今社会和政治的新的著作深表歉意。我希望,选用这本教科书的教师们能把此书作为一种工具来鼓励他们的学生对我在有限篇幅里所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在我撰写本书以往三个版本的过程中,有许多人为我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在他们中间起最重要作用的是尼尔·斯梅尔塞和迈耶·扎尔德。尽管每一位优秀的学者都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现实世界中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而他们则是向我们大家提供了极好的可供仿效的研究者角色的典范。

最后,我还要感谢对这一项目及我的所有其他著作给予一贯支持和帮助的我的家人。他们用极大的耐心和好意来设法容忍我的当务之急,而这种帮助有时通常是给予孩童或年长者的。因此,我要特别将此书奉献给我的三个孩子:尼古拉斯、汉纳和瑞贝卡。我希望,21世纪的世界比刚刚过去的世纪充满更多的社会公正和较少的暴力;同时,我也希望,我的孩子们能按照他或者她自己的方式对实现这样的一种世界现实作出贡献。

安东尼·奥罗姆